

世界经典 汉译名著

· 插图珍藏本 ·

[英] 约翰·多恩 John Donne / 著
林和生 译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丧钟为谁而鸣

生死边缘的沉思录

思考人类处境
在与上帝的对话中自我勉励
紧急时刻的祈祷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丧钟为谁而鸣

生死边缘的沉思录

[英] 约翰·多恩 John Donne / 著
林和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 / (英) 多恩著；林和生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3

ISBN 978-7-80225-581-4

I. 丧… II. ①多…②林…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I56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6584号

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

(英) 约翰·多恩 著 林和生 译

责任编辑：许 彬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5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09年3月第一版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581-4

定 价：29.8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中译本序

在钟声中，我们向死而生

约翰·多恩这本书，原名《紧急时刻的祷告》，翻开第17章，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话：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

《紧急时刻的祷告》诞生于1623年，其时伦敦瘟疫大爆发，无数人死于非命，多恩本人也不幸染病，走到死亡边缘（参见本书导言）；在肉身即将万劫不复的紧急时刻，他以信仰为最后依凭，内心涌出热诚的祷告，包括上述“丧钟为谁而鸣”的不朽感念。

多恩这段感念被后人无数次引述，而当下的引述，起因于眼下我们自己的“紧急时刻”。公元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突然爆发，震撼世界，也让我所在的这座现代大都市在惊天动地的摇撼中经历了彻骨的恐惧，与死神擦肩而过。迄今近十万罹难者和失踪者，数十万伤员，数千万受灾人群，无数可歌可泣的伤痛和悲恸，那些朴实的山里人！尤其那些无辜的山里孩子！……

所有一切让我不得不问：为什么一定是他们？！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我？！他们代我赴死，正如多恩所说，他们的死也是我的

4

死；另一方面，如果我此刻还活着，那是他们用死的代价换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的死也意味着我的生：正因为他们代我赴死，所以我得以逃生。这是双重意义的“向死而生”：不仅是个体一己的哲学，也是同体大悲之爱；不仅意味着感恩，也意味着责任。

两千年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勉力维系着“未知生焉知死”的乐感文化，因为恐惧死亡而逃避责任，更不知感恩；尤其三十年来，物质与欲望持续高速增长，信仰的真空也日益暴露；5·12死难者让我们猛醒！——我们和死难者始终是一个血肉模糊、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此而言，他们的死难绝不仅仅是无可弥补的沉痛与憾恨，而同时告白了我们生者的责任。这责任既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欠负，也意味着我们与他们的分担和分享——恐惧与死亡砥砺了信仰；这是个体意义上的崇高，也是民族和人性的未来；所有这一切将超越肉体的局限，在灵魂的意义上接受一次终极的裁定。

钟声为死难者鸣响，也为我们！

在钟声中，我们向死而生！

林和生

2008年6月8日

成都百花村

中译本前言

约翰·多恩的生命本色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希伯来书》11：13-16

约翰·多恩：大诗人？大主教？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 - 1631）是谁？

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回答说：“英国玄学派诗人，散文作家，对 17 世纪和 20 世纪的作家影响巨大。”而 1993 年的英文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这样写道：

英国玄学派大诗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伦敦最大教堂——译注] 主教（1621 - 1631）。他之闻名于世，不仅因其世俗诗作（大部分写于他 1615 年任教职之后），也因其宗教文字，包括宗教散文、论文、尤其布道词，这些文字在 17 世纪堪称翘楚。

这是一个相对全面的答案，虽然留有弘一法师所批评的“人以文传”的重大缺陷。原来，多恩在玄学派大诗人的身份之外，还是著名的大主教，并写有足以与其诗作相提并论的宗教文字。然而，大概由于由尼采所告白的“上帝之死”事件，人们似乎只知道，或者只看重多恩的诗人身份，对于他的宗教身份，人们或者浑然不知，或者视而不见（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即为典型一例），或者像英文版《新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样仅仅归

结为“文字”；无独有偶，多恩的宗教名句“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则被普遍误认为诗句。^①

“文字”即“言”，无论如何迂回曲折，最终是“肉身成言”的产物，这样，我们又像帕斯卡，打开一本书，本想看到一位作者，结果却无法不遭遇一个人。

时代和家庭

约翰·多恩（1572 - 1631），莎士比亚（1564 - 1616）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 - 1626）的同时代英国同胞。他呱呱坠地之际，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才刚刚辞世二十六年。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猛烈抨击天主教罗马教廷的腐败，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展开，迅速席卷欧洲，其结果是基督教分裂为传统的天主教与迅速崛起的新教，基督徒不再仅指传统的天主教徒，也指新兴的新教徒，两者在当时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确定英国国王取代罗马天主教教皇成为英国国教的首脑，英国国教事实上脱离了天主教，新教教义遂成为其信仰基础。1553年，天主教徒玛丽女王即位，复辟天主教，镇压迫害新教徒，激起人们对新教的同情。1558年11月17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即位，重新确立新教为国教，而天主教及其教徒反遭背弃，众多天主教徒和神父被判叛国罪，其财产被查抄，人们穿墙破屋搜捕潜藏的天主教神父，同情者或窝藏者则以重罪论处。一时间，监狱人满为患，不得不扩建或新建；监狱中风行酷刑，据目击者描述，其景象令人发指。^②不过，这一极端形势并未延续多久，1559年，伊丽莎白一世实行宗教和解；斗争虽未结束，但形式已然缓和。据20世纪最新统

^① 例证之一可见：费迪曼、梅杰，《一生的读书计划》，谢天海、苑爱玲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

^② 参见 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faber and faber, LONDON · BOSTON, 1981, 第一章。

计数据，从 1585 年正式通过反天主教法案，到 1603 年伊丽莎白一世辞世，近二十年间，仅有一百名天主教神父与五十三位相关世俗人士（其中包括两位妇女）被处死，据称，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①

1572 年，约翰·多恩出生于伦敦一个颇负名望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伦敦商人，任一家大公司（Ironmongers' Company）的主管。多恩四岁时，父亲去世，六个月后，母亲嫁给富裕的天主教医生、皇家医学院院长约翰·赛明斯（John Syminges）。

多恩的母亲是诗人和剧作家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多恩外公）最小的女儿，她自己的母亲（多恩外婆）琼·拉斯蒂尔（Joan Rastell），是大名鼎鼎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亲侄女。莫尔是英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著名的天主教徒，领导着 16 世纪初最重要的英国知识分子圈子，不仅以《乌托邦》一书著称于世，而且毕生忠诚天主教，于 1535 年的宗教斗争中被诬陷以致处死，四百年后（1935 年）被追谥为圣徒。

有证据表明，多恩对自己身上的母系血缘有着深刻的自觉意识，曾怀着明显的自豪感谈到托马斯·莫尔爵士，及其“对天主教始终如一的忠诚”。^② 也由于这一血缘，他被卷入当时宗教斗争的核心地带，见证了天主教徒的殉教，就此他写道：

我思考这一殉教；我相信，出于这样的血缘，我的家庭（不涉及太远的旁系）成员，以及整个家庭的命运，由于忠诚天主教而经历了太多的损失和痛苦，远甚于别的家庭。^③

① 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p. 3. 另有数据称，到 1585 年，英国天主教会还能通过十倍于常规的高额佣金来试图维持教徒的忠诚，这一方面说明形势的一边倒，另一方面说明宗教氛围的相对宽松。同上，p. 1。

② 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p. 1.

③ 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p. 6.

事实正是如此。1564年，即多恩出生之前8年，多恩外公不得不流亡国外，以保持对天主教的忠诚。10年后的1574年，即多恩两岁那年，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官方搜查了多恩家附近母牛胡同中的布朗夫人家，逮捕了躲在那里的多恩的舅公、前圣奥西斯修道院（St. Osyth）修士托马斯·海伍德，于当年6月14日，凌辱并处死。多恩两位舅舅艾利斯·海伍德和雅斯培·海伍德宣誓成为天主教耶稣会士；他们以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传统为荣，并保留着后者的一枚牙齿作为信物。雅斯培·海伍德从国外非法潜回英国，成为国内耶稣会士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与妹妹（多恩母亲）保持联系，并很有可能在妹妹家避过难。1583年，雅斯培·海伍德被通缉，他试图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逃跑，但因中途遭遇风暴而被捕，与其他五位天主教神父一道被判高级叛国罪，准备处以绞刑、淹毙和肢解，暂时囚禁于伦敦塔内。其间，多恩母亲常去探望，提供给养，并代哥哥秘密传递耶稣会有关信息，甚至掩护哥哥的继任者假扮多恩的父亲，潜入伦敦塔与之会面，时年12岁的多恩也随行前往，以消除守卫的怀疑。^①

1584年，多恩16岁。按当时一项法律，年满16岁者，必须向作为国教的新教宣誓效忠，否则可能被判监禁甚至死刑，只有大学生可以例外。当年10月，多恩和他15岁的弟弟亨利考入牛津大学。1588年，多恩继父去世，同年，他转入剑桥大学。1591年，多恩母亲再嫁里查德·瑞恩斯福德（Richard Rainsford）。1592年，20岁的多恩进入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学习法律；就在这一年，弟弟亨利窝藏了一位天主教神父，这位神父后被抓捕，被判绞刑，尚未死去便遭剖腹。亨利被判重罪入狱，后于新兴门（Newgate）监狱死于瘟疫。多恩也因此遭到严密监视。

1593年，多恩21岁，按法律继承了遗产并独立。就在这一年，多恩改宗新教。^②

1593年之后多恩的生命轨迹，读者可参见本书附录“约翰·

① 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p. 6.

② John Carey, *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 p. 8-12.

多恩年表”，本文不再赘述，而将有限的篇幅集中于多恩改宗新教一事。对于此事，学界一直存在不同阐释。有人把多恩称为“背教者”，这种称谓不难从心理学上找到依据，并可从上述历史背景寻求支持。^①沿这一方向看来，本文认为有关问题过于复杂，所以暂不打算从学理上加以深究。本文希望沿另一方向找到正确的解答，这个新的方向就是本书。

本书：紧急时刻的亲在和见证

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如书名所见，本书是一组“紧急时刻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所谓“紧急时刻”，指1623年多恩罹患瘟疫。之前两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

多恩当年罹患了什么瘟疫？近四百年来，学界存疑于斑疹伤寒（typhus）和回归热（relapsing fever）两者之间。今天在Google上搜索“typhus, Donne”，得结果约两万条；另搜索“relapsing fever, Donne”，得结果约一千条；另考察“紧急时刻的祷告”文本发现：第一，当时医生警告的“回归”发热（即第23章所谓“复发”）未成现实；第二，病程中多恩发作“斑疹”（即本书第13章所谓“斑点”）。两相比较，本文倾向于斑疹伤寒一说。

今天知道，斑疹伤寒是一种高致病性瘟疫，如果没有氯霉素、四环素等现代抗生素，50岁以上患者病死率高达40% - 50%。多恩染病那年已经51岁，再考虑到近四百年前人类医疗卫生状况的落后，可以认为，1623年，多恩因罹患斑疹伤寒而陷于生死未卜、凶多吉少的绝境。按常理，他将被巨大的恐惧压倒，日常生活一塌糊涂，更难谈得上什么高纯度、高强度的精神生活。

^① 本文提供上述历史背景，是为了尽可能保持客观立场。

然而，凭藉纯金般的信仰，恪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①这一最高诫命，以及“爱人如己”^②的第二诫命，多恩挺过来了。他不仅没被瘟疫所“阉割”，反而写下二十三篇“紧急时刻的祷告”，这是一组历史性的辉煌文献，是坚贞信念的里程碑，从中我们能读出多恩与瘟疫之间的相持、较量、战胜，其间的血肉模糊、惊心动魄、峰回路转，浏览本书部分章目（尤其第10章—19章）即可见一斑：第13章，出现了斑疹；第15章，昼夜无法入眠；第16章，“藉着附近教堂的钟声，我每天在他人葬礼上为自己悼亡”；第17章，“钟声为别人温柔敲响，它告诉我：你必死”；第18章，“钟声响起，通过他告诉我：我已死”……这是最黑暗的时刻；然而，就在最黑暗的第17章，多恩挥笔写下那条不朽名句：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

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思考（参见第17、18章），是人类精神史上最痛切、最复杂、最虔敬、最忠贞、最彻底、最热诚、最具爱心（Agape）的奉献，正是这一闪光与荣耀的奉献，让我否定了所谓“背教者”的结论。

多恩改宗是一个历史事实，从这一历史事实，一位研究者可以从中得出“背教者”的象征性结论，这是他的学术自由。然而，我个人宁可相信，多恩改宗，正是所谓“神启神学”与“历史神学”的结合使然。其中“神启”的一面，我们无话可说，那是上帝的拣选，是天国的秘密；其中“历史”的一面，有必要简

① 太22：37

② 太22：39

略探讨一下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主流，及其潜在的神学倾向。简要地说，文艺复兴意味着人性（严格说来是欲望）的大发现与大扩张，其象征性的精神事件见于1285年前后，其时，大诗人但丁登上意大利勒佐省的俾斯芒托瓦山顶，向大自然“投射”（project）他内心的“壮丽风光”，^①文艺复兴导致至今数百年来历史主流文化：个人主义、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其中包含着“信仰私人化”的潜在倾向；我个人认为，这一潜在倾向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基督信仰从天主教向新教的转型：每个人直接对他自己的耶稣负责，而不是通过天主教路线的神父，这一点可视为个人主义历史身位浸润基督信仰的一个重大结果。当然，以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这一历史转型也可归结为一次“神启”。^②总而言之，我个人把多恩改宗视为“神启”的结果，是多恩个体生命所遭遇的恩典，而本书，即是这一恩典的一次文本的落实和见证，一个坚贞信仰之“道成肉身”的结果和象征。历史是最大的“肉身”，现实生活亦然，多恩在本书写就的名句“丧钟为谁而鸣”化入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肉身”，深入人心，蔚为奇观。今天，在Google上搜索“丧钟为谁而鸣”，所得结果凡十数万条，引用者包括文人、诗人、平民、记者、律师、法官等等，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本书：“方言”还是“信言”？

我相信，只要读过本书，就会从中深感多恩作为大诗人的情感、语言和思想张力。然而，在本书中，多恩呈现在我们面前，首先不是大诗人，而是大信者。

《圣经》上写道：每个人“按……所得的恩赐，各有不

^① 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93页以下。

^② 我个人认为文艺复兴沿袭古希腊路线，即经典的西方路线，而《圣经》不属于这一路线。我把《圣经》视为西方与东方之外的“第三路线”。

同”。^①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②

我个人把诗人的语言看做“方言”。就此而言，多恩是说“方言”的大师。毋庸置疑，二十三篇“紧急时刻的祷告”之所以震撼人心，与多恩的“方言”天才相关，然而最终，“方言”只是载体，它所转载的“信言”，才是这一历史奇观的真正成因。

按多恩的信仰，依照圣灵的安排，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有使徒、先知、教师、灵异者、医生、说方言的、翻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这就是所谓的“万事相互效力”。

然而，多恩不满足于说“方言”。诗，在他看来，不过是短暂青春的情人；唯有信仰，才足以陪伴他直到此生的终结，而后新生。多恩最终选择了“信言”来表达他的终极关怀——来自天国的大爱，恰如圣徒保罗所说：

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话，乃是对上帝说话，因为

① 罗 12：6-8

② 林前 12：4-12